

文史哲研究丛刊

刘知幾及其《史通》 文学观研究

吕海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知幾及其《史通》文学观研究 / 吕海龙著.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1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8619-6

I .①刘… II .①吕… III .①史学理论—中国—唐代
②《史通》—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K092.42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9067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刘知幾及其《史通》文学观研究

吕海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94,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8619-6

I · 3218 定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吕海龙准备出版《刘知幾及其〈史通〉文学观研究》，多次向我求序。最近，他送来了书稿的打印件。我翻阅这书稿，其中有些题目和篇章比较眼熟，是当年我曾经看过，提过意见，甚至动手批改过的。面对这些熟悉而又新鲜的文字，思忖着该如何作序，不禁油然想起许多往事……

海龙是我在上海大学带的第二届博士生，2008年进校，当时我正在做“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课题，他的师兄师姐也都参加了。等到海龙学完必修课程，积够学分，准备开题时，我们的课题已进入中后期，没有适合他做的小题目了。他和我商量，我也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踌躇。

博士论文选题，一般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心中早就有了打算，甚至已有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老师觉得那题目可行，于是师生两便，论文题目顺利地确定下来。另一种是学生起初并无想法，主要想听老师的，也就是要老师来出题目。这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为难，但却也经常会遇到。我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便会仔细询问学生读书的情况，特别是他硕士阶段的学习情况，常常通过对他硕士论文的了解，发现和指出那论文还有可以深入开掘之处，引导他就在已经初步开垦过的地方继续做下去。我尽可能不让他另起炉灶，做一个陌生的题目。这样做，效果往往也不错。当然还有一种

情况，就是老师正在做某个课题，题目比较大，同学又颇感兴趣，于是就因势利导地将学生组织进来，把项目的部分内容与他们的论文相结合，一面让他们分担一些任务，一面也就完成了相对独立的论文，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可是，吕海龙的情况与这三种都不大相同。他并未带着想做的或可继续做的题目来攻博，也无法加入我们的课题组。怎么办呢？幸好他对我充满信任，表示愿意听我的，给他一个题目就行。

做《史通》研究这个题目，是我提出来跟他商量的。当时，我自己正在写刘知幾《史通》叙事观的文章，把《史通》来回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史通》博大精深，即使仅就叙事观和文史关系而言，也不是我一两篇文章所能阐说得完的，我的研究只是触碰了刘知幾和《史通》的一小角而已。作为唐代一位文史大家，刘知幾这个人值得全面研究；作为穿越一千三百年时光传到今天的一部基本完整的大著作，《史通》更需要深入研究。虽然历代学者在这块科研的沃土上已有所开垦，但我觉得继续开拓的空间还很大，海龙如果在此安营扎寨深耕细作，必会有所收获，也许够他忙活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同时也把我设想的研究步骤，把他在所剩两年左右的博士生时间大概能够做到何种程度，尤其是研究的种种困难告诉他，让他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

海龙竟然很快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从读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开始，从梳理《史通》所涉及的大量人名、书名入手，反复理解，多方核查，细心辨析，努力吃透，做出了两个很有用的《索引》。同时广搜相关研究资料，从前人对《史通》的训释，到今人撰写的刘知幾年谱和研究论文；从文学史、批评史界对《史通》某些篇章的阐说品评，到史学史界对《史通》和刘知幾历史地位的论述，都尽可能地搜集阅读。海龙知道自己的文史基础并不雄厚，也相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之类道理。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实没少下笨工夫，笨工夫

也没有亏待他。在边读边做边想之中，他积累了知识，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试写了一些读书报告式的短文。他又有一大特点，就是勇于将这些不成熟的短文拿给我看，不惮我有时相当严厉的批评乃至痛责。在我看来，读他的这些文章并对之提意见或动手修改，既是我分内的工作，也是对我读书研究的一种促进。我乐意于这种不仅是付出的付出，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吧。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我的研究生导师吴世昌先生说过的话：“我是导师，我指导你们做李商隐、苏东坡、周邦彦的论文，但你们才是研究他们的专家，你们在自己的范围内，要钻研得比我专，比我深！”我与海龙，不光是我指导他，在《史通》研究方面，他也在鞭策着我呢。我真希望我带的研究生与我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既是师生，也是学术上的朋友，是互帮互促的同行。

海龙以《〈史通〉与刘知幾文史观研究》的论文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眼前这本书稿是他割取毕业论文中论刘知幾文学观的部分，吸纳答辩老师们的意見增补修润，又围绕主题新写了好几章而成。其中有一些在刊物发表过，还含有编辑先生的劳动。当海龙投入谭帆教授门下做博士后继续研究刘知幾《史通》时，我曾叮嘱他多向谭先生请教，相信谭先生的真知灼见也会点点滴滴地反映在现在的书稿中。书稿大约有 20 万字左右，我已没有精力细读。我希望海龙将此书交给出版社之前，自己再从头至尾细读数遍，参考各方面意见，尽可能改正讹错，提高质量。然后再请负责任的编辑把关和付梓。这是海龙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应该有个良好的开端。

据我所知，海龙确实有继续深入研究刘知幾及其《史通》的意向，他为此申请了好几个省部级和国家级的课题项目。从他这次把书名定为“文学观研究”亦可窥见——刘知幾及其《史通》的研究题目还多着呢，文学观只是一个方面。除了从文史两科出发的题

目,还有属于文献学方面的,比如《史通》所涉人物的考订,所涉书籍的查考叙录,乃至《史通》文本的重新校对勘定、笺注汇评等等。不知海龙是否愿意、是否可能长期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些事情?我不能也无意勉强海龙,但我希望他做,也相信他若坚持发扬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精神,就一定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出新成绩来。我期待着。

是为序。

董乃斌

2017年9月20日于上海寓所

目 录

序	董乃斌	001
绪 论		001
第一节 刘知幾在初唐文坛的影响与《史通》现存篇目及 版本		001
第二节 《史通》研究现状		011
第三节 本书研究内容概览		030
第一章 刘知幾“弱冠及第，射策登朝”考辨		034
第一节 及第于何年		035
第二节 所任何官		038
第三节 游学何处		044
第二章 《京兆试慎所好赋》考论		049
第一节 “失次”与“阙名”		049
第二节 赋作风格与贡解地点		054
第三节 试赋的题目、题型及用韵		066

第三章 《安和》诗考论	073
第一节 题目及内容	075
第二节 反映的史实及创作背景	079
第三节 以刘知幾诗学观为辅证	084
余 论	086
第四章 《史通》的“实录”诗学观	089
第一节 “不虚美、不隐恶”的诗歌高标及对鲍照的推崇	089
第二节 对庾信、唐太宗及宫体诗的评判	094
第三节 与白居易讽喻诗创作理论的契合之处	098
余 论	106
第五章 文、笔之辨与刘知幾的散文观	108
第一节 “文”、“笔”之辨的兴起与消歇	108
第二节 刘知幾“圆融文史”的散文观	119
第三节 刘知幾散文观对梁肃的影响	134
第六章 《史通》“叙事为宗”的小说观	154
第一节 小说以“叙事为宗”	156
第二节 叙事以“附于物理”为准	163
第三节 小说叙事的“流俗”性	171
第四节 对欧阳修等史家之小说观与小说创作的影响	179
余 论	185

第七章 《史通》“崇真”、“尚简”的叙事观	190
第一节 内容的求实和叙事的虚构	191
第二节 对叙事细节的处理	199
第三节 叙事手法举隅	207
第八章 “文史分合”轨迹述论	214
第一节 文史分合：从事实到观念	214
第二节 文史之分与文学的自觉	218
第三节 刘知幾的文史分合观	223
第四节 刘知幾《史通》文学观对当代文学与学术的新启示	229
参考文献	233

绪 论

第一节 刘知幾在初唐文坛的影响与 《史通》现存篇目及版本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旧唐书》卷一百二、《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皆有传。《旧唐书》以“刘子玄”标目,其传内则于景云(唐睿宗年号)以前,称“知幾”,其后称“子玄”。其云:“景云中……时玄宗在东宫,知幾以名音类上名,乃改子玄。”^①《新唐书》“刘子玄本传”则以“子玄”之称贯全篇。其认为:“刘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②两书表述文字虽不尽同,但意思基本一致。即刘知幾,本名知幾,字子玄。后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故以字“子玄”行世。至清,为避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讳,提到刘知幾其字的时候,则改称“子元”。另据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引张说语,刘知幾又被时人呼为“刘五”^③。考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五可知,刘知幾有同父兄长二人,依次为知柔、知章。

① 刘昫《旧唐书·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② 欧阳修《新唐书·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519页。

③ 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唐会要》卷六十四云:“刘五修实录(刘五即子元也),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括号内为王溥自注。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五十七”引张说:“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将“刘五”改为“刘生”。

《旧唐书》“刘子玄本传”载：“知幾兄弟六人。”“刘五”之称应因其于同宗兄弟中排行而来。

刘知幾为唐河南道徐州彭城从亭里（今属江苏徐州铜山区）人。“彭城从亭里”后又改为“高阳乡居巢里”。关于刘知幾籍贯的更名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说明。因为名称的这一变更，直接彰显了刘知幾对当时文坛的影响之大。据《旧唐书》“刘子玄本传”言：刘知幾所撰《刘氏家史》、《谱考》自云其出自彭城从亭里诸刘，为“宣帝子楚孝王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故“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后以修《则天实录》功，果封居巢县子。又乡人以知幾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①。“高阳乡”这里指的是彭城。据先秦两汉典籍记载，彭城得名于彭祖受尧封地于此。而彭祖为颛顼玄孙。颛顼号高阳氏。故彭城被称为高阳乡。而“从亭里”改成“居巢里”，则主要是因为刘知幾自云为“居巢侯刘恺之后”，且自己又被封为“居巢县子”的原因。刘知幾这一代，人文蔚起，在当时以“文学知名”。名声所震，以至于其乡里之地名都因为刘知幾的原因作了更改。

刘知幾生前即在初唐文坛影响甚大，声名远播。刘知幾“幼奉庭训，早游文学”^②，“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③。“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后“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④。久视元年（700），“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⑤。四十岁的刘知幾参

^① 刘昫《旧唐书·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② 刘知幾《史通·自叙》，见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③ 刘昫《旧唐书·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8页。

^④ 刘昫《旧唐书·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8页。

^⑤ 欧阳修《新唐书·徐彦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2页。

于修撰并与张说、李峤、徐彦伯、徐坚等“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①。长安四年(704)，刘知幾擢凤阁舍人。徐彦伯《赠刘舍人古意》赞其为“女床阙灵鸟，文章世所希”^②。开元四年(716)，被唐玄宗指定为其生母作《昭成皇太后哀册文》。其文为纪念惨死于武则天时代的睿宗之德妃即玄宗生母而作。玄宗即位后，追尊生母为昭成皇太后，知道刘知幾长于作文，遂命其执笔。刘知幾序中交代了写作此文的原因：“(玄宗)嗟镜奩之不御，痛珠匣之沈光”，“顾西陵以永怀，托东观而书美”^③。全文辞藻华美、精于用典、对仗工稳，又充满了感情。

刘知幾死后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梁肃誉其曰：“文公允文，辟儒门兮。”又赞云：“儒为天下表。”^④“文”乃唐时文职“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⑤获朝廷所赠的极美之谥，列《唐会要》“溢法”条第一字。考《唐会要》“溢法”可知，上官仪、韩愈、令狐楚、李翱皆谥曰“文”。白居易去世三年后，其弟白敏中担任中书侍郎、平章事时，上疏为白居易争取了一个“文”的谥号。可见，刘知幾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在其身后不久已为朝廷所认可。就某些方面来说，对当时文坛之影响，可比肩上官仪、韩愈等人。

长期以来，在研究者的眼中，刘知幾都是作为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盛名之下，遮蔽了其作为文学家及文论家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刘知幾在文学、文论方面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旧唐书》曰：“刘(指刘知幾)、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其学“博通”，其文“典雅”，其作“文学之书，胡宁比哉！”^⑥

^① 刘昫《旧唐书·徐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5页。

^② 彭定求《全唐诗》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0年，第821页。

^③ 董诰《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2792页。

^④ 董诰《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中华书局，1983年，第5290页。

^⑤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20页。

^⑥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零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5—3186页。

刘知幾一生著述甚夥，惜多已散佚，所幸最重要的著作《史通》及其诗赋数首，今天还可看到。

《史通》撰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书成之后迄北宋，人们对《史通》究竟是文集还是史著亦或是史评之作没有统一的认识。五代后晋史家刘昫等撰写《旧唐书·经籍志》“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①，但却没有收录《史通》一书。北宋《崇文总目》把《史通》置于“杂史”类。欧阳修、宋祁等人，因对《旧唐书》有所不满，重新修撰唐史时，于《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中没有收录《史通》，把《史通》与李翰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颜竣的《诗例录》、钟嵘的《诗评》等文论著作附列于“丁部集录”的“总集类”。而南宋郑樵《通史·艺文略》则认为《史通》是“正史”中的“通史”之作。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图书分类中把《史通》列入“史评类”。《史通》在目录学著作中的位置，这才固定下来。

《史通》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史通》一书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定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结果竟然使得《史通》其书传播不广。同时也伴生了一些问题。余波所及，以迄于今^②。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虽然前人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对于刘知幾《史通》诸多相关看似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有必要在这里作下系统的梳理。下面从书名、篇目的存佚、内容的修补、文本的译介以及当下通行本等五个方面对《史通》版本在后世的流传情

^① 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3页。

^② 如明代大兴《史通》研究之风时，万历五年刊刻的《史通》序言中，张之象有“《史通》其书”历岁滋久，浸就散逸，宋儒朱晦翁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之语。正如今人扬州大学王嘉川教授所指出：“这句话只能看作张之象为其校刻《史通》而作出的宣传性‘广告用语’。”（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9页）然此说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定影响，如刘占召《史通评注》“前言”，未作考辨，便直接引用了张之象此语。其云：“很少有人刊刻，连朱熹也‘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刘占召《史通评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况作详细的介绍。

首先是书名问题。刘知幾在《史通·原序》中说明了书名的由来，他暗指此书系承司马迁、班固而作，其云：“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刘知幾对史学有着非凡的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感。《史通·自叙》云：“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刘知幾本意上承孔子，删定诸史，成万古不刊之论。然而由于诸多顾虑，不能直接删削古今史书，退而编著《史通》，把精力放在对史著的间接评论上。“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歿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一书的命名，潜含了刘知幾为天下史家立法则的雄心。这从其仿《白虎通》命名其书为《史通》可以看出。《白虎通》是《白虎通义》的简称，“‘通义’二字表示它不是代表某一家的看法，而是统一的、可以通行天下的结论”^①。司马迁后人被封为“史通子”一事，见《汉书·司马迁传》：“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②这里的“史通”，是封号。刘知幾借此说明，有关“史”的问题，可以有

^①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2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662页。

“通”之称。同时，也借以表明，司马迁是其崇仰的榜样，通过其书之取名来表达对司马迁致敬之意。刘知幾还点明了其书名由来的另一原因：“博采众议，爰定兹名。”这可说明其书之名称在当时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书的名字，有时寄寓了编著者的美好心愿或者远大志向，但后人不一定对之完全认可。如《淮南子》，最初被刘安名之为《鸿烈》，其书卷二十一《要略》之“此《鸿烈》之《泰族》也”句下自注云：“鸿，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①又高诱《叙目》云：“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②在刘安看来，其书包含光明宏大之理，为学者悟道之必读。然自《汉书·艺文志》始，即将该书纳入诸子类“杂家”之列。至《隋书·经籍志》始，则被径称作《淮南子》，而为后世通用之书名，似有降格之嫌。与其不同，《史通》之名，在后世一千多年的流传中，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惟《旧唐书·刘子玄传》中有一次称《史通》谓“《史通子》”^③。这说明后世对刘知幾《史通》一书命名良苦用心的理解与认可。

其次，在后世传播中，《史通》产生了篇目存佚的问题。弄清楚这一问题，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逐一来看典籍中的有关记载。《史通·自叙》中自言“廿卷”。《旧唐书·刘子玄传》曰：“知幾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④《史通》及《旧唐书》都只言卷数为二十卷，未涉及篇目的具体数字。

《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文史类》收录“刘子玄《史通》二十卷”。另《新唐书·刘子玄传》论及《史通》修撰的缘由和具体的篇数：“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这是最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第858页。

^②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第2页。

^③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④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早涉及《史通》篇数的记载。《新唐书》言《史通》其书总为四十九篇,但没有说明篇目是否已有散佚。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九认为,《史通》全书为二十卷五十二篇,其中三篇散佚。其云:“《史通》二十卷,评议作史体例,商榷前人驳难,其秩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又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缺,外篇十卷,凡十三篇。”今存《史通》内外篇顺序、卷篇数目及散佚篇目与《玉海》所言相符。

今存《史通》分为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在前,主要论及史家体例,凡三十九篇,存《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等三十六篇,佚《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外篇则多述史籍源流与古人得失,有《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凡十三篇。其中《点烦》篇,刘知幾原用红黄之笔点出他认为的繁辞琐句,以示可删。后因传世版本未能保存其所点印记,故而刘知幾当年所示可删点的具体内容今已不可知。

《史通》内篇之《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欧阳修撰《新唐书》时已不得见。清人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三十二曾补亡,所补虽对了解《史通》亦有参考价值,但因汪氏与刘知幾所距年月甚远,且补文于史无根,恐未必符合刘知幾本意,故而仅此处点到为止,下文亦不作分析。

当然,也有人认为所谓亡佚的三篇本来就不存在,如金毓黻于其《中国史学史》第八章曾言:“《新唐书》本传已云《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且考《内篇》之序,所亡三篇,皆在《自序》之后,颇为不伦。或本无此三篇,抑编者之错置欤?”

再次,《史通》还涉及对篇目具体内容的修补问题。《史通》外篇的《点烦》一篇,刘知幾将其认为多余的内容用朱红雌黄之笔点出以示可删,但是,由于原本不存,今存的本子也没能保存点烦的痕迹。故而只能从后人代点之作来推断刘知幾的意思。《史通·点烦》的相关修补工作很早就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早在江户时代,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即有猪饲敬的《补修〈史通·点烦〉》等^①。中国近代学者吕思勉有《史通点烦篇补》一文,最早刊于1929年的《光华期刊》,后于1934年收入其《史通评》一书。吕思勉在文章中说因刘知幾“点处已不可见。辄以鄙意补之。岂敢谓有当于前贤,亦聊以药今人文字枝蔓之病耳”^②。洪业亦于1935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史通点烦篇臆补》一文中代为点烦。洪业“近见某先生(按:即指吕思勉)亦理此篇(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史通评》,页一一一至一二五),所为多与鄙意未合,因复校录旧作”^③。刘知幾红黄之笔所点内容今虽不可具知,但其篇中细书侧注尚存,吕、洪二人所点皆据刘知幾侧注,所以代点内容其论有据。又因为吕文先出,洪文认为吕文“所为多与鄙意未合”,而为争鸣商榷之作。两人所点烦的不同之处暂且不论,相同之处或应该与刘知幾本意有相合的地方,对于研究《史通·点烦》篇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故而对吕、洪所代点内容的一致之处,可作为研究对象以探刘知幾本意。

此外,要论及的是《史通》的译介问题。最早的外文译本为平凡社1966年出版的增井经夫《史通》日文版本。西胁常记翻译与注释的《〈史通〉内篇》与《〈史通〉外篇》两书,分别于1989年2月、2002年2月,由东海大学出版会出版。又洪业一直感兴趣于《史

^① 海外学者的研究可参考朱政惠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见《史林》,2006年第4期)。

^② 吕思勉《史通评》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③ 洪业《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40页。